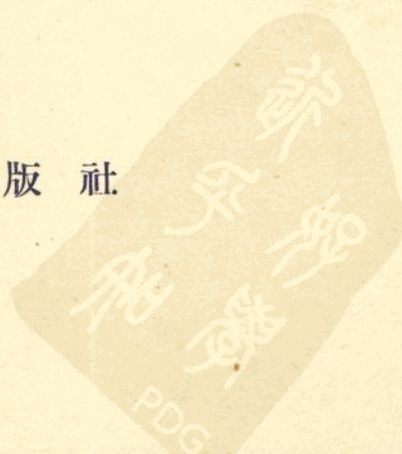


恩 格 斯

反 杜 林 論

第 三 分 冊

人 民 出 版 社



第二編 政治經濟學

一 對象和方法

政治經濟學在最廣的意義上說來，是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交換的那些規律的一種科學。生產和交換是兩種不同的職能。沒有交換生產也能進行，可是交換——正因為它必須是生產品的交換——所以沒有生產便不能存在。這兩種社會職能，每一種都處於對它來說在很大程度上是特殊的那些外界作用的影响之下，因此，每一種有着在很大程度上屬於本身的特殊的規律。可是，另一方面這兩種職能在每一瞬間又互相制約、互相影响到如此程度，使得它們可以被稱為是經濟曲線的橫座標和縱座標。

人們生產和交換生產品時所處的条件，各國各有不同，在每一個國度里，一代一代各有變化，所以對於一切國度和一切歷史時代，政治經濟學不能都是一樣的。從野蠻人的弓、箭、石刀和罕見的作為例外的交換關係，到近代的千匹馬力的蒸汽機、紡織機、鐵路和英格蘭銀行，中間不知道隔着多少距離。巴塔哥尼亞（在南美洲阿根廷南部。——譯者）的居民，沒有進到大批生產和世界貿易，也沒有進到票據的投機或交易所里的破產，所以誰要是想把巴塔哥尼亞的政治經濟學和近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歸結成為同一規律，那麼，顯然地除了最平凡的一般的东西以外，他是再不能給予任何东西的。所以政治經濟學在本質上說來是一種歷史的科學。它所

涉及的資料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它首先研究在生產和交換的發展上每一個別階段的特殊規律，只在這樣研究的結末，它才能確立極少的非常一般的、可以用於一般的生產和交換的那種規律，這上面不言而喻，對於一定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適用的規律，同樣也適用於具有同樣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所有歷史時期，例如隨着金屬貨幣的採用，一系列的規律發生了作用，這些規律對於所有採用金屬貨幣來進行交換的歷史時期和國度都是適用的。

生產品的分配方式與方法，同樣取決於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的生產方式與方法、交換方式與方法，取決於這一社會的歷史前提。在擁有公共土地所有制的氏族公社或農村公社中（所有開化的人民都帶着這種公有制或者帶着它的非常顯著的殘余而進入於歷史中），生產品的頗為平等的分配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如果公社成員之間在分配生產品上面發生了頗為重大的不平等，那這就是公社已經開始崩潰的標誌，大的農業和小的農業，根據它們所從而發展起來的那些歷史前提，可以有其不同的分配方式，可是十分明顯的，大的農業總是造成了和小的農業所造成的十分不同的分配方式，大的農業要以階級對立為前提或者造成着這種階級對立——奴隸主和奴隸的對立，地主和勞役制農民的對立，資本家和僱傭工人的對立；而在小的農業中，則從事於農業生產的個人之間的階級區別，並不是必然的，反之，這種區別的存在正是指明小農經濟已開始瓦解。在已經完全是自然經濟或主要是自然經濟的那種國度里，金屬貨幣的採用和傳播總是與以前分配中的、或慢或快的變革相聯系的，而這變革使得各個個人之間分配上的不平等——也就是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對立——日益增長起來。中世紀時代的地方行會的手工業生產，使得大資本家和終身被僱傭的工人，不可能存在，正如近代的大工業、近代的發展了的信貸制以及與上述二

者的發展相適應的交換形式——自由競爭——必然要產生這些階級(指資本家與工人。——譯者)一樣。

可是和分配的區別一起，出現了階級的區別，社會分成為特權的和無權的、剝削的和被剝削的、壓迫的和被壓迫的階級。而同一部落公社的自然形成的集團，最初只是為着保護他們的共同利益(例如在東方為着灌溉)、為着抵禦外來敵人而形成的國家，從此以後就以同樣的程度獲得了那樣一種功能：即，利用暴力去保護統治階級的生活地位與統治地位，以反對被統治階級。

可是分配並不是生產和交換的單純消極的結果；分配反過來又影響生產和交換。每一個新的生產方式或新的交換形式，開始時不僅受到舊的形式以及與此相適應的政治結構的阻礙，而且受到舊的分配方式的阻礙。新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不得不通過長期的鬥爭來爭取與自己相適應的分配。某種生產的和交換的方式，愈是活躍，愈有改造與發展的能力，分配也就愈快地到達這樣的地步，即：超越了它所從而產生的那種生產的與交換的方式，並與之發生衝突。前面已經說過的古代原始公社可以存在好幾千年(它們現在還可以在印度人和斯拉夫人那里遇到)，直到它們與外界來往使得這些公社的內部產生財產上的區別，由於這些區別它們開始瓦解的時候為止；反過來看，近代資本主義生產，雖然存在還不到三百年，雖然還只在大工業出現以來，就是說總共不過一百年前，才達到支配的地位，可是它已在這一短時期內產生了分配中的那樣的對抗——一方面資本集中於少數人手中，他方面無產羣眾集中於大城市，——因着這種對抗，它必然要趨於滅亡。

社會內每一時期分配和物質生存條件的聯繫，如此深刻地存在於事物本性之中，以致經常在人民的本能上反映出來。當一定的生產方式處在自身發展的上昇階段之時，甚至在和這種生產方

式相適應的分配方式里面受到損失的那些人，也會贊美這種生產方式。大工業興發時代的英國工人，就是如此。進而言之，當這種生產方式對於社會還是正常的那個時候，對於分配來說，滿意的情緒也會占支配的地位；那時即使發出了抗議，也只是從統治階級自身的人們中發出來的（聖西門、傅立葉、歐文），而在被剝削的群眾中則恰恰得不到任何響應。只有當這種生產方式已經走過自身沒落階段的頗大一段行程之時，當它一般已經腐朽，當它的存在條件大部分已經消失而它的後繼者已在敲門的時候——只有在這時候，分配上的愈益增長的不平等，才被認為是非正義的，只有在這時候，人們才開始從以往過時了的那些事實出發去申訴於所謂永恆的正義。這樣的對於道德和正義的申訴，在科學上並沒有絲毫令我們前進，無論道德上的義憤是如何的入情入理，經濟科學總不能把它看作是證據，而只能看作是象徵。經濟科學的任務，卻是在於確証：現在開始顯露出來的弊病，是現存生產方式的必然的結果，同時也是這一生產方式快要來到的崩潰的標志，更進而在向前崩潰的經濟的運動形式里面發現能夠消除這些弊病的、將來新的生產組織與交換組織的因素。義憤創造詩人，它在人們描寫那些弊病以及在抨擊那些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歌頌協調的人們（他們否認或者掩飾這些弊病）之時，是完全恰當的，可是要把義憤作為每一當前情況的証明，那意義是如何的小——這點從下面的事實中可以清楚看到，即：在所有過去歷史的每一時代，都是並不缺乏此種義憤的資料的。

按廣義來說，政治經濟學是這樣一種科學，它研究人類各種社會中生產和交換所借以進行的那些條件和形式，以及與此相適應的生產品分配所借以進行的那些條件和形式——這樣的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尚有待於創造。直到現在，政治經濟學所給予我們

的，差不多完全限於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生和發展；它從批判封建生產形式的和交換形式的殘余，開始證明它們為資本主義形式所代替的必然性，然後從正面——就是說在其還是有利於社會的一般目的範圍內——闡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以及與此相適應的交換形式的規律，最後按照社會主義去批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是說從反面去闡明其規律，證明這種生產方式由於自身的發展，迅速地接近這樣的一點：就是它自身不可能再存在下去。這一批判，證明出：資本主義的生產的和交換的形式，愈益成了生產本身的不可忍受的桎梏；證明出：這種形式所必然形成的分配方式，造成了這樣的、日益不可忍受的階級狀況，造成了一方面數量愈益減少、財富愈益增加的資本家，另一方面數量愈益增大、情況一般說愈益惡化的無產的僱傭工人，這兩方面之間日益尖銳化的對抗。結末，這一批判證明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範圍內所造成的、而它自己已經無能駕馭的大量的生產力，正在等待着那樣一種為了共同的有計劃的工作而組織起來的社會去把它們拿過來，以便保證社會的所有成員都有生活資料和自由發展其能力的條件，而且其程度將日益往上增長。

為着全面地進行對於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光知道資本主義的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夠的；還必須對在它之前存在過的或者在發展較差的國度內和它同時存在的那些形式，至少對其主要特征，加以研究，並予以比較。總的說來，進行這樣研究與比較的直到現在還只有馬克思一個人。所以直到現在，對於資產階級以前的經濟的這一理論領域上所已經確立的一切，我們差不多完全是應當歸功於他的著述的。

狹義的政治經濟學，雖然在十七世紀末，在一些天才人物的頭腦里已經產生了，可是像重農學派和亞當·斯密所作的那樣正面

的定式化，却實質上是十八世紀的產兒，它是與其當代偉大的法蘭西啓蒙學者的成就相并立的，并且和他們一起共同帶着那個時代的所有優點和缺點。我們關於啓蒙學者所說的話，也可以用于那時的經濟學家，在他們看來，新的科學不是他們時代的關係和需要的表現，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現，經濟科學所發現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不是由歷史規定的那種經濟活動形式的規律，而是自然的永恒規律；這些規律是從人的本性中引伸出來的。可是，仔細予以研究，就可以看到，這裡所說的人，只不過是當時正處在轉變為資產者的過程中的那些中等市民罷了，而他的本性，也不過是在於根據當時的由歷史規定的關係，來從事生產和貿易罷了。

在我們充分認識了我們的“批判的創始人”杜林先生及其在哲學上的方法之後，我們可以容易地預言，他對於政治經濟學的理解會是什麼個樣子；在哲學上，當他不是簡簡單單胡說八道的时候（例如在自然哲學上面），他的見解也不過是對於十八世紀那些觀點的諷刺畫。在他看來，這上面所說到的，不是發展的歷史規律，而是自然的規律、永恒的真理。社會的關係，如道德和法，不是按照各該時代的實際歷史條件來決定的，而是因有名的兩個男人之助來決定的，這兩個人中一個人或者是壓迫另一個人，或者是沒有壓迫他，而這后一種情形，可惜直到現在還沒有遇到過。所以如果我們事先說：杜林先生也把政治經濟學歸根到底歸結為終極的最后真理，為永恒的自然規律，為同義反復的、毫無內容的公理，而同時把全部他所知道的政治經濟學的那些積極的內容，從後門偷偷摸摸地拉了進來，如果我們事先就說，他不是把分配（作為社會現象來講）從生產和交換中引伸出來，而是把它交給他的有名的兩個男人去作最后的解決——如果我事先這樣說，那麼大致是不會錯的。由於所有這些早已是我們所熟知的把戲，所以我們在這裡只要加以

簡單的分析就够了。

真的，在第二頁上杜林先生已經向我們宣稱他的經濟學是根據於他在哲學上所已經“確立了”的東西，並且“在某些主要點上，是根據於那種在更高的研究領域中已被最後完成的更高級的真理的”。到處是那種令人生厭的自誇，到處是杜林先生對其所確立的和完成的東西自詡勝利。真的，這樣最後完成的東西的例子，我們已經看得夠了——完成得好似人們熄滅一根吱吱喳喳地燃燒着的蠟燭一樣（“完成”和“熄滅”，德文都是“ausmachen”。——譯者）。

緊接着，我們看到了“所有經濟的最一般的自然規律”——這就是說，我們猜對了。可是這些自然規律，只有在這樣的場合之下，才能產生對於過去歷史的正確理解，即：如果“人們在更確切的規定性中——由於隸屬和集團的政治形式，這些規律的結果採取了更確切的規定性——去研究這些規律。這樣的體制，如奴隸制、僱傭奴役制加上它們的嫡親兄弟——暴力所得的財產，應當被認為是純粹政治性質的社會經濟制度的形式，直到現在它們總是形成了一種框子，只有在這種框子裡經濟的自然規律才能表現出作用”。

上述這句話，起着一種軍樂隊的作用，它像瓦格納歌劇的主調一樣，告訴我們那兩個有名的男人就要出場了，但是這句話的意義還不止於此——它還成了杜林全書的主體。在說到法律的時候，杜林先生除了以社會主義的詞句很壞地翻譯盧騷的平等論以外，再不能給我們以別的什麼東西——這種翻譯得比較好得多的標本，早在許多年前就已經在巴黎工人們所光顧的任何咖啡館中可以听到了。在這裡杜林先生又給我們以並不較好一些的對於經濟學家的怨言之社會主義的譯文，這些經濟學家埋怨說，國家的干涉、暴力的干涉歪曲了永恆的自然經濟規律及其作用。這樣，杜林先生在社會主義者中間陷於應有的完全的孤立。每一個工人

社会主义者，不論屬於哪一民族，都很清楚地知道，暴力僅僅是保护剝削，而不是創造剝削，知道他所受的剝削的基礎是資本与僱傭劳动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在純粹經濟的基礎上而完全不是在暴力基礎上產生的。

往下，我們听到說，在一切經濟問題上“可以区分兩種过程——生產过程和分配过程”，在它們之外，以膚淺著名的薩伊(J.B. Say, 1767—1832)还加上第三种过程——消費过程，但是薩伊自己和他的門生，都沒有能够在这上面說出什么有道理的东西來。可是，据杜林先生看來，交換或流通不过是生產的分类，因为在生產品落入最后的真正的消費者手中以前所應經歷的一切，都要歸屬於生產——当杜林先生把本質上不同的，虽然互相制約的兩種过程(生產和流通)混为一談，並且泰然自若地斷言排除这种混亂只能“產生混亂”之時，他只不過証明他不知道或者不懂得最近五十年來流通所獲得的那種巨大發展。他書上以下的內容，証實了這點。不僅如此。他既然把生產和交換混在一起，把它們簡單地作為生產，這樣他就把分配放在生產之旁作為同生產毫無共同之处的完全不相干的第二個过程，可是我們看到，分配在其主要點說來，總是該社會的生產关系和交換关系以及該社會歷史前提的必然結果，知道了后者，就可以确实地推断出該社會內佔支配地位的分配方式。同时，我們看到，如果杜林先生不願遺棄自己在道德、法和歷史的學說上所“確立的”原則，那麼他就不能不否定這一基本的經濟事實。他之不能不否定，特別是由於他要把自己的這兩個不可缺少的男人，偷運到政治經濟學里面來。等到分配順順利利地同生產和交換脫離任何联系之后，這一偉大的事變，最後就終於發生了。

讓我們在此首先回顧一下，在道德和法的問題上，杜林先生是

如何論斷的。在那里，杜林先生从一个人說起，他說道：“一个人当其被設想为孤独的，或者換句話說，設想为不同其他人們發生任何联系的时候，这一个人是不能有什么責任的，对他來說，不存在什么义务，只有志願。”可是这一个沒有責任的孤独的人，除非是天堂里不幸的“原始犹太人亞当”——在那里他沒有任何罪惡，其簡單原因，是在於他沒有任何犯罪的可能——此外，还能是什么別的人呢？可是就是現實哲学所創造的这位亞当，也註定要犯罪了，突然地在这位亞当之旁出現了另一个人，即使不是塗脂抹粉的夏娃，也是第二个亞当，亞当立即有了責任——而且立即破坏了这个責任，他不是把这兄弟当作平等的人擁抱於怀，而是把他压在自己支配之下，加以奴役——而全世界整个歷史直到今天总是吃了这第一次犯罪之苦，这原始奴役罪之苦。因此，据杜林先生意見，这歷史是一錢不值的。

順便指出，如果杜林先生以为把“否定的否定”形容为犯罪及贖罪的古老故事的模寫，就已經充分地使其陷於恥辱的話，那么對於他的同一故事的最新版本，我們該說些什么呢！（關於贖罪，我們到一定时候“还要切近地看看”——用御用報紙的話來說）無論如何，我們寧願選擇古代閃族部落的神話，說男人和女人一起脫出無罪状态还有些意思，而讓杜林先生去享受那种利用兩個男人來造出犯罪故事的那种人的無比光荣吧。

現在我們來看，他怎样把犯罪譯成經濟学的語言：“魯濱遜的形象無論如何可以作为生產这一概念的合適的邏輯圖式，他孤独地以自己的力量对抗自然而不必去和任何人分担什么……为着明白解說分配觀念的最主要之点，兩個人的邏輯圖式也是同样適用的，這兩個人的經濟力量，联合了起來，因之顯然地對於他們所分得的份額，应当在某种形式之下互相商量妥當。真的，为着充分確

切地表明某些最重要的分配关系並在其邏輯的必然性中从胚胎状态去研究其規律起見，只需要这样簡單的二元論，別的什么也不需要了…… 在这場合上，可以設想是兩个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行动，也可以設想是一方完全服从於另一方而把力量合併起來，这时，一方降为經濟服役的奴隸或簡單工具，因此，也就被当作工具來看待…… 一方面，在平等状态和卑賤状态之間，另一方面，在無窮的威力和單方面的積極参加之間，存在着整个系列的中間階梯，而全世界歷史就是要以形形色色的事件來填滿它們，在这里根本的先决条件是对於歷史上有权与無权的各种体制要有一个包罗万有的观念”，……而最后整个分配被轉成为某种“分配的經濟权力。”

現在杜林先生脚底下最后又重新獲得巩固的基礎了，他手携手地帶着兩个人可以自豪於当世了。可是在这三个人之后，却还站着某一个無名者。

“資本並沒有發明剩余劳动。在所有这样的地方，当社会的一部分拥有生產資料的壟断权，而劳动者不論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不得不在維持自己所必需的劳动時間之外，加上剩余的劳动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主生產生活資料，这里所有主是雅典的貴族，还是愛脫魯斯的僧侶，还是羅馬的自由民，还是諾曼的貴族，还是美國的奴隸所有者，还是瓦涼的領主，还是近代的地主或資本家，都是沒有关系的。”（馬克思“資本論”德文版第一卷第二版第 227 頁）^①

当杜林先生这样地知悉了什么是已往一切生產形式（由於它們是运动於階級对立之中的）所共通的基本剝削形式之后，他只要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參看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265—266 頁。——譯者註

使用他的兩個男人，就可以把現實經濟學的深厚基礎建立起來了。他一分鐘也不遲疑地出來實行這一“創造體系的思想”。這裡事情的主要點是在於：超出維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工作時間之上的勞動，沒有得到報償。這裡稱為魯濱遜的亞當，強迫第二個亞當——禮拜五，用全力來工作。為什麼禮拜五工作得比維持他生活所必需的時間要長呢？對於這一問題，在馬克思那裡可以一步一步地找到解答。可是在這兩個男人看來，這是太過冗長的歷史了。事情一眨眼就做完了：魯濱遜“壓迫”着禮拜五——強迫他“作為奴隸或勞動工具來執行經濟的服役”，並且給他的待遇“也僅僅像工具一樣”，杜林先生用這樣的最新的“創造性的思想”，可以說是能夠收一箭雙鵰之效：第一，他可以不用費力去說明那些直到現在所存在過的分配形式，其區別和其原因：所有這些都簡簡單單是毫無用處的，它們都是依據於壓迫之上與暴力之上的。對於這一問題，我們很快還要回過頭來講的。第二，他這樣就把整個關於分配的理論從經濟的基地搬到道德和法的基地上，就是說，從確定的經濟事實的領域搬到多少是不確定的意見和感覺的領域中，這樣他就再用不着去研究或證明，而只要出來宣佈宣佈就夠了；這樣他就提出了要求，要勞動的生產品的分配，不是按照其實際原因來進行，而是按照杜林先生所認為是道德的和正義的那種樣子來進行。可是杜林先生所認為是正義的樣子，絕對不是不變的，因此，這就離真正的真理很遠了，因為據杜林先生本人的聲明，這種真理“一般說是不變的”。真的，在1868年他斷言道（“我的社會條陳的命運等”）：“任何較高級的文明都有使所有制採取更尖銳的表現的那種傾向，近代發展的實質和前途就在於此，而不是在於法權和統治範圍的混淆”，再說，那時他一般地沒有能力看到“僱傭勞動之轉變為獲得生活資料的另一種形式，怎麼樣能夠在某一個時候符合於人類本性”。

的規律，符合於社會機体的自然的與必要的構造”。這樣，在 1868 年，私有財產制和僱傭勞動，是自然的、必要的，所以也就是正義的，到 1876 年，兩者都成了暴力和“掠奪”的結果，所以也就是不正義的了。由於不可能知道再過幾年之後，這位如此強大的和猛進的天才將以什麼東西為道德的和正義的，所以我們在說到財富的分配時，無論如何，還是以遵循現實的客觀的經濟規律為好，而不要以杜林先生關於正義與非正義的暫時的易變的主觀想像為依據。

近代的勞動生產品的分配方式，包含着貧窮和奢侈、飢餓和荒淫的顯然矛盾，如果我們對於這種分配方式即將發生變革的信念，僅僅建立在認為這種分配方式是而非正義的，而正義終究會在某一個時候獲得勝利的那種認識之上，那麼我們的情況就不妙了，我們就只得長期等待了。夢想黃金世界快要來臨的那些中世紀的神秘主義者，已經意識到了階級對立的非正義性。在新歷史的發軔期，在三百五十年前，湯麥斯·苗彩爾已經向全世界大聲宣揚了這種信念。在英國的和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中，同樣的呼聲也曾發出過，可是往後消散了。為何同一的消滅階級對立和階級區別的號召，在 1830 年以前遭受到勞動的和受苦的羣眾的冷遇，而現在却獲得千百萬工人的共鳴，為何這一號召以同各國大工業的發展同樣的順序，同樣的程度，相繼征服了各國，為何在一個世紀的時期內，這一號召已經獲得了這樣的威力，使其可以同所有聯合起來的敵對力量進行激戰，而深信能在最近的將來取得勝利，——這些都是由於什麼原因呢？原因是：近代的大工業，一方面形成了無產階級，這個階級在歷史上第一次能夠提出這樣的要求，不僅是要消滅這一或那一特殊的階級組織，這一或那一特殊的階級特權，而且要消滅階級本身；這一階級處在這樣的地位，使其不得不提出這一

要求，不然就会落到中國苦力的情狀中去；另一方面，大工業，造成了資產階級这样一个階級，它拥有一切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壟斷權，它在每一投机狂热时期和接踵而來的每次崩潰破產中，都表明出自己再也不能往前支配那种已經發展得越出它權力之外的生產力——在这一階級的領導之下，社会正迅速趋于毀滅，正好像司機沒有力量去推开閉着的保險閥的那种機車一样。換句話說，这上面的原因是在于：近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產生的生產力及其所造成的生產品分配制度，已經同这一生產方式本身發生不可容忍的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使得为要避免整个近代社会陷于毀滅起見，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上能够消除一切階級区分的那样一个革命，就一定要爆發起來，这一容易覺触到的物質的事实，正以或多或少清楚的形式和不可克服的必然性，印入于被剝削的無產者的意識之中——正是根据这一事实，而不是根据这一或那一書房里的思想家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觀念，才确立了近代社会主义的勝利信心的基礎。

二 暴力論

“一般的政治对于經濟法權形式的关系，在我的体系中，被決定得如此坚决同时又是如此的特創，为帮助研究這個問題起見，我特別把它指点出來，想必不会是多余的。政治关系的形式，是歷史上根本的东西，而經濟的隸屬則不过是一种效果或特殊情形，所以总是第二等的事实。有几个最新的社会主义体系，把完全相反关系的一目了然的外表，当作指導的原則，他們断言政治隸屬的形式似乎是从經濟的狀態中產生的。当然这种第二等的作用，就本身來看無疑地是存在的，而且在現在，特別被感觉到；可是起源却

應該從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尋找，而不應該從間接的經濟力量中去尋找。”在別的地方，杜林先生也是這樣的看法，他“從這種原理出發，就是：政治狀態是經濟情況的決定性的原因，相反的關係，只不過是第二等的反應作用…… 只要人們還把政治集團不看作是達到自己目的的出發點，而看作僅僅是達到吃飽肚子這目的的手段，那麼這些觀點無論看來是如何的急進社會主義的和革命的，在這些觀點中總是隱藏着相當部分的反動性”。

杜林先生的理論如此。在這個地方，並且在許多其他地方，他只是簡單地把它宣佈出來，或者說把它頒佈下來。在厚厚的三大部書里，我們從來沒有看到他作過最小的企圖來證明它，或者駁倒相反的意見，即使證據比野蕈還便宜些，杜林先生也沒有給出一個來。魯濱遜奴役禮拜五的有名罪案，本來就已經把這個問題解決了。這是一種暴力的舉動，所以也就是政治的行為。由於這種奴役，是世界從古到今全部歷史的出發點和基本事實，由於它把非正義的原始罪惡沾染於全部歷史，而且沾染到這樣的程度，使得在往後的歷史時期中，這種奴役制只能被減輕些，被“更間接的經濟隸屬形式所代替”；由於直到現在居支配地位的“暴力所得的財產”，總是根據於最初一次的奴役行動之上，所以顯然地，全部經濟的現象，應該由政治原由來解釋，就是由暴力來解釋。誰要是不滿足於這種解釋，那末就是隱藏的反動派。

首先應該指出，人們一定要擁有杜林先生這樣自以為是的態度，才能把這個觀點當作非常的“特創”，——實在它絲毫也不是。認為顯赫的國家的政治的行為在歷史上是決定性的這樣一種觀念，已經是和歷史記載同樣古老的了。這種觀念正是關於人民發展的材料為何保留給我們的如此之少的原因，人民的這種發展恰恰是在喧囂的行動的背后不聲不響地進行着的，上述的觀念支配

於一切以往的歷史觀中，它第一次為法國復辟時代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所動搖；這上面“特創”的地方，只在杜林先生對於這一切竟又絲毫不知。

再次，即使我們暫時認為杜林先生的話是正確的，即使承認從古到今的全部歷史，真的可以歸結為人對於人的奴役，那這也還不能給我們解釋事實的究竟。倒反而首先就發生這樣的問題，為什麼魯濱遜要去奴役禮拜五呢？單是為着取樂么？當然不是。反之，我們看到禮拜五“是被逼着作為奴隸或簡單工具來進行經濟的服役，並且也被僅僅當作工具來對待。”魯濱遜之所以奴役禮拜五只不過是使他為魯濱遜的利益來作工。但是魯濱遜怎樣能夠從禮拜五的勞動中獲得好處呢？這上面只是因為禮拜五以其勞動所生產的生活資料，比魯濱遜為使禮拜五能夠維持自己勞動能力而不得不給予禮拜五的數量為多。所以，和杜林先生的直截了當的命令相反，魯濱遜把奴役禮拜五所造成的“政治集團，不是當作達到自己目的的出發點，而是看作僅僅是達到吃飽肚子這目的的手段。”現在讓他好好地想一想，他怎樣去和自己的主人和老師杜林先生相處吧。

這樣杜林先生所特意編造出來，用以證明暴力是“歷史上根本東西”的性質的那種兒戲的例子，只不過證明暴力僅僅是這樣一種手段，其目的則相反地是經濟的利益。目的比那種用來達到這種目的的手段要“根本得多”，同樣的，在歷史上，關係的經濟方面，也比政治方面要根本得多。所以上述例子所證明的恰巧與它所要證明的相反。在魯濱遜和禮拜五的例子如此，在從古到今的一切統治和奴役的場合上情形也都是如此的。用杜林先生的優雅的語句來說，壓迫總歸是“為達到吃飽肚子這目的的手段”（在最寬廣的意義上去了解這一目的），可是無論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它都不是

什么“为着自己本身”而建立的政治組合。只有像杜林先生那样的人才能这样設想，以为租稅在國家內只是“第二等”的效果，或者以为近代的統治的資產階級和被压迫的無產階級的政治組合是“为着自己本身”而存在的，而不是为着統治的資產者的“吃饱肚子的目的”，就是說不是为着賺取利潤和積累資本而存在的。

現在再回头來講我們的兩個男人。魯濱遜“手握利劍”把禮拜五變成自己的奴隸。但是魯濱遜为了能做好这点，除利劍之外还需要別的东西。奴隸並不能使每个人得到好处，为着要从奴隸身上得到好处，必須具备兩種东西：第一，奴隸劳动所需的工具及对象；第二，維持奴隸困苦生活所需的資料。所以在奴隸制成为可能以前，先应在生產的發展上达到一定的程度，並在分配的不平等上达到一定的程度。如果要使奴隸劳动成为整个社会的支配生產方式，那么还需要更大得多的生產、商業和財富積蓄的增長。在古代自然興發起來的土地公有的農村公社中，奴隸制或是完全沒有，或是只起極其从屬的作用。在最初的農民城市羅馬，情形也是如此；等到後來，羅馬變成“世界的城市”，意大利的土地所有權日益集中於人數不多的非常富有的所有者階級手里的时候，那时農民的人口才被奴隸的人口所代替。波斯戰爭的时候，柯令斯地方的奴隸數目达到四十六万，在愛琴地方达到四十七万，平均每个自由民有十个奴隸。为此就須要比“暴力”更多一些的东西，就是說需要有高度發展的美術工業和手工業以及廣大的商業。美國奴隸制所賴於暴力者远比其所賴於英國紡織工業者為少，在那些不種植棉花的地方，或者在那些不像邊境諸州那样以蓄奴售與植棉各州為業的地方，奴隸制不經暴力而自行消失下去，這簡簡單單是因為奴隸制不上算。

这样，杜林先生把近代的財產称作得於暴力的財產，並且把它規定為“这样的一种統治形式，即：其基礎不但在於排斥同胞們使